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K295.1
X6891

TONGSHI GUDAI

# 上海通史

熊月之／主 编

第2卷

## 古代

马学强 著

A0909473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第一章　远古时代

上海享有历史悠久的荣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考古的发现[1]。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数十年考古调查与发掘，在今上海地区发现了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二十多处。在太湖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上，目前已确定有下列三种前后承袭的文化(括弧内为碳－14年代)：

马家浜文化(前5090±150—前3990±135)

崧泽文化　(前3910±245—前3230±140)

良渚文化　(前3305±130—前2130±100)[2]

这三种文化在上海境内都有发现。其中，崧泽文化即以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命名。现代考古发掘，为了解史前时期上海先民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 一　上海地区最早的古文化：马家浜文化

上海境内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冈身以西和冈身地带，即通常所说的上海西部地区。这样的分布格局，与远古地质变迁，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联系。

China

1958年，在上海青浦县赵巷崧泽村北，当地农民挖塘时发现古物，后经1960—1961年、1974—1976年等几次发掘，挖出了一批古墓，还有大量的石器、玉器、骨器、陶器、兽骨与稻种等遗物。这就是著名的“崧泽古文化遗址”。崧泽遗址分布在假山墩上，在已发掘的数百平方米内，获得了印纹陶—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三叠层，马家浜文化处于最下层。马家浜文化距今约6000年，是目前上海地区发现最早的古文化。



图1-1 青浦崧泽遗址全景

马家浜文化类型的遗址，以浙江嘉兴的马家浜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和浙北平原，上海已经发现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有3处。[3]

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活动的重要因素。据考古研究表明，这一带在7000年前海平面已上升到目前位置，“上海西部地面原来比较高起，全新世以来就未受海水淹没”[4]。大约在6000年前，西部高地冈阜出现了上海先民的足迹。上海历史的第一页便在这里揭开。

在上海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骨耜，这表明原始农业已经出现。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下层稻粒的出土，可以把上海西部栽种稻谷的历史上溯到6000年之前。当时，这一带湖沼密布，植被茂盛。各遗址所出土的大量猪、狗、牛、獐、四不像、鹿、蚌、蛤、鱼、龟等动物残骸中，尤以猪、鹿骨骸最多，且被人工敲碎，属食用后丢弃。这些迹象表明，人们的生活已由原来极为简单的渔猎采摘，逐渐向以畜牧和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化了。

China

1987、1989年，在青浦县崧泽遗址中发现了两口属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井。两井均为直筒腹，口呈圆形，井壁光滑，井中水源丰富。井中填土为黑灰土，夹有陶器残片及兽骨[5]。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水井实例[6]。上海先民很早就已使用的这种直筒形水井，其形制设计合理，一直沿用至今。水井的出现，有利于改善滨海居民的饮用水质。

马家浜文化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手工业，包括石器、骨器、玉器、陶器，等等。石器的制作已采用通体磨光和双面对钻孔技术，但比较厚重。石斧和有段石锛的出现，反映了木工工具的进步。骨器分骨耜、骨镞，这是与原始农业、狩猎业的发展分不开的。玉器较为少见，有的也只是装饰品。马家浜时期的陶器多为手制，大的器物多用泥条盘筑法，以氧化焰烧成，因此器壁不甚平整，陶色常见红褐色。陶器器形类别很多，其用途不一，有的制成炊器，有的用于贮藏食物，器型有豆、罐、壶、管嘴盉和垂囊形盉，晚期出现了鼎。陶器的表面皆为素色，少量有纹饰也比较简单。如锯齿形附加堆纹饰于釜、鼎腹部，凹弦纹饰于豆把和鼎肩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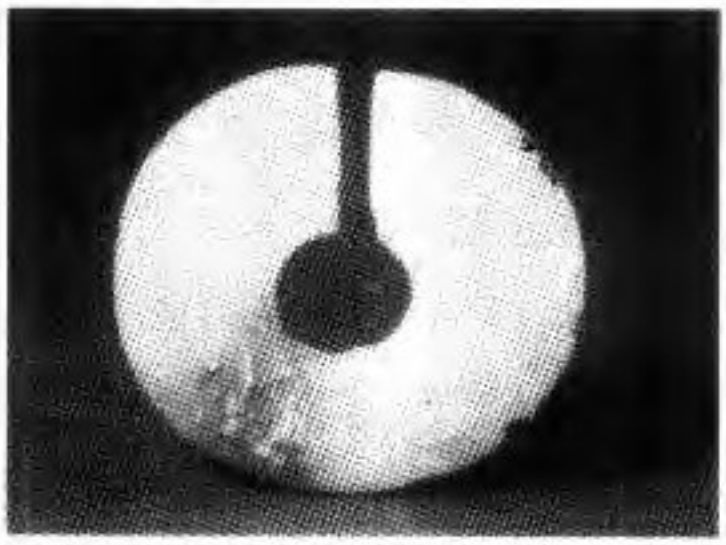


图1-2　马家浜文化玉玦



图1-3　马家浜文化陶釜

（青浦县崧泽遗址下层出土）

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墓葬都以平地盖土掩埋，多为俯身葬，头向北，也有多人成直线相互叠压埋葬及同性合葬墓。随葬品多为日用器皿。

China

后来这一带继起的崧泽文化,便直接渊源于马家浜文化。从年代看,马家浜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

## 二 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前后延续900年,其遗址主要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在上海境内发现含有崧泽文化堆积的遗址有青浦崧泽、福泉山、寺前村等。

崧泽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北方大汶口文化的中早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和大河村类型的前期、邻近的杭州湾南岸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期文化。[7]

### 崧泽人的社会生活

考古发掘材料表明,崧泽人聚集居住在较为干爽的高地茅舍村落中,在村落周围,垦殖了小块水稻田,驯养了狗、猪。附近湖泊沼泽中的鱼、蚌、龟、鳖、虾等水产,周边高地的野禽、獐、四不像、鹿,这些动物为上海先民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肉食资源。稍远的林间,偶尔亦有老虎等猛兽出没。当时的气候温热潮湿,比现代温度可能略高一点。

在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崧泽文化地层中,发现有崧泽时期居住遗迹。它的住房呈长方形平地建筑,房柱底下使用方形垫板,以免下陷,灶坑开在室外,住房附近堆积大量食后丢弃的猪、鹿、獐、狗、鱼、龟、蛤等动物碎骨、碎壳及残破陶器。水井开挖在居址之中,如松江汤庙村遗址发现的崧泽文化古井[8],口径约0.7米,深2米,井壁使用芦苇、竹子编织物保护。

崧泽文化是一种以农业和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原始文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崧泽文化中，许多陶器羼和使用了稻谷壳和稻草屑料，这说明水稻种植在当时已很普遍。从松江汤庙村遗址出土的扁平三角形石犁，证实农业生产已开始进入犁耕阶段。这是一个飞跃。大量兽骨的出土，其中猪骨，经鉴定为家猪，表明饲养业已经兴起。此外，还发现了许多陶网坠和骨镞，这主要是用于渔猎的。

崧泽文化时期手工业技术较马家浜文化有所进步，反映在制作石器、骨器、玉器、陶器等各种生产、生活用具上，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品种、形纹，都有了全面提高。

石器大多作为生产工具使用，种类有斧、锛、凿、矛、镞、纺轮等。材料绝大多数为中生代侏罗纪、白垩纪时期的火山喷发物，系中酸性火山岩，质地致密，细腻坚硬。石器制作技术已能通体精磨，并能使用管状器钻孔方法。典型石器有长方形顶部斜翘弧刃石斧、长条形石锛、方柱形石凿等。在崧泽遗址中，还发现当时的石器制作场。在约四平方米范围内，出土石料及石器半成品 34 件，所见石坯有斧、锛、凿 3 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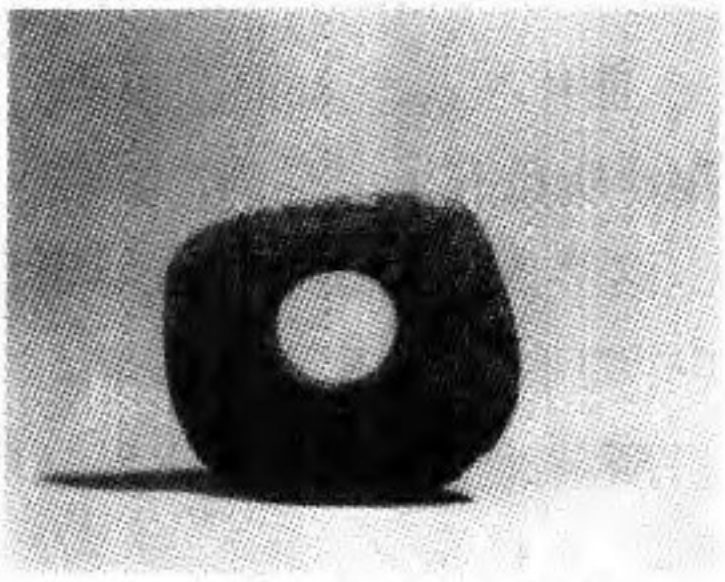


图 1-4　崧泽文化石斧



图 1-5　崧泽文化石锛

（崧泽遗址出土）

China

玉器的制作已开始与石器制作有所区别。玉器主要用作装饰品，如璜、环、镯等饰件，一些玉器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像置于死者口中的玉琀。在制作工艺上，已用线加砂，通过往来磨擦锯割玉片。玉器的增多反映崧泽文化时期装饰风气的盛行，颈部佩璜，手臂带镯、环，上海先民已开始注意打扮自己。



图 1-6 崧泽文化玉琀
（崧泽遗址出土）

骨器多以动物肢骨制成，经过劈折、削磨，变得比较光滑。种类有骨镞、骨锥等。骨镞分柳叶形、圆锥形多种形状，可能用于捕猎禽兽。兽牙磨成牙刀，是用于切割的。骨锥以细长的动物肢骨磨成，一端尖锐，主要用于穿刺缝缀衣物。骨锥的发现，说明先民们已具有了一点缝缀、编织技术。另外，从陶器上的编织纹饰推测，人们可能已利用动植物纤维捻线来编织衣服。

陶器多为生活用具。陶器的形制、种类繁多，从用途上分，有炊具、盛贮器、食器及装饰件。常用的是鼎、豆、罐、壶，其形式较为复杂。其他尚有釜、甑、缸、坛、钵盆、盘、瓶、澄滤器、环、网坠等等。崧泽文化所出土的大量陶器，其内外壁都十分圆整光滑，不少能依稀见到旋痕。可见，当时的人们已能熟练掌握慢轮修整技术，陶器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崧泽陶器以灰陶和黑衣陶为主。这类泥质陶，质地比马家浜时期更细洁，烧制温度也有所增高。夹砂陶器中的羼和料基本上由蚌壳屑、稻谷壳构成。这样，烧成后能使陶器十分轻巧，且能提高防裂度。崧泽陶器纹饰丰富多采，有压划纹、镂孔纹、剔刻纹、动物纹、彩绘纹及陶塑，颇富创意。压划纹变化多，以竹编纹为主，将其使用在陶罐外壁，美化效果强烈。镂孔纹将成组的圆形及弧边三角形施于

China



编织纹黑陶盖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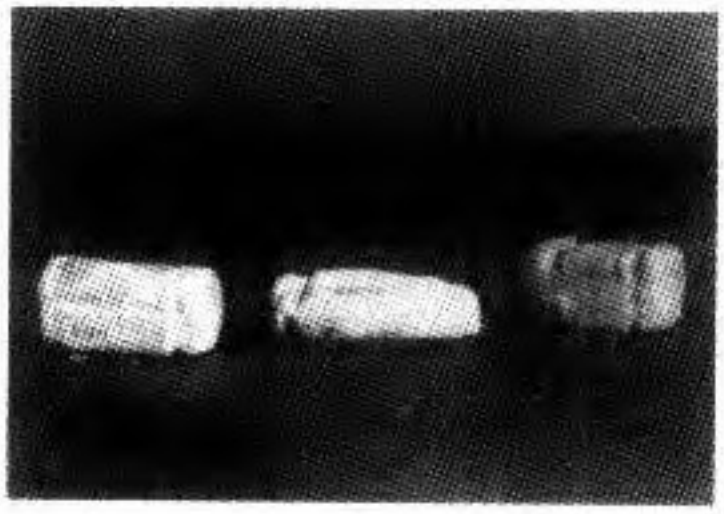
陶　豆



竹节形瓶



陶　鼎



陶网坠

图 1-7　崧泽遗址出土陶器一组

China

高矮不一的陶豆柄、足部,使豆的造型更加美观。崧泽遗址出土的猪首匜是一件陶塑,它将猪的造型融合于陶器上,将日常的生活用品与艺术造型有机结合起来,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这一猪首形雕塑,有眼、耳、鼻、嘴,嘴外伸为流[9]。崧泽陶器极富艺术性,除猪首匜外,还出土了一件竹节形瓶,小口窄肩,竹节形器形,底部按三个扁方形器足,整器仿造一段竹竿,栩栩如生。在寺前村遗址发现的一件双层镂孔壶,口部外卷,口沿弧曲作花瓣形,器腹圆鼓有两层,外层整体透雕弧边三角形与圆形组成的图案,腹下有喇叭形器底,底边也刻成花瓣形,整器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是一件罕见的远古工艺品,充分体现了崧泽时期人们的聪明才智。崧泽文化陶器的造型与纹饰,取材于日常生活所见,兼有一定的想象,以优美、精细见长。

## 埋葬习俗与社会形态

崧泽文化的墓地一般选择在住地的北面和西面。上海地区经过发掘的重要墓地有青浦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埋葬方式大多为单人葬,平地堆埋,不挖墓坑,将死者仰身直肢,头向东南放在地面,然后堆土掩埋。有陪葬的各种器物,主要陪葬品有石斧、石锛、石凿、陶鼎、陶罐、陶豆及陶壶等。少数死者在手臂上佩戴象牙手镯或玉镯,颈部戴有玉璜,个别死者含有玉琀。有关玉琀的作用,东晋葛洪《抱朴子》有这样的记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崧泽时期墓葬玉琀的发现,是否可以证明这样的习俗在远古的上海就已存在?从同期墓葬中随葬品的出土情况来看,各墓的差别似乎不大。这表明当时的社会还是以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为基础的。在随葬品的分布上,女性随葬品略多于男性。葬有玉器和彩绘陶的墓葬,经鉴定基本为女性墓,看来,女性在社会上处于受尊重的地位。

从崧泽文化时期墓地整体上说,一处墓地往往有几个墓群,每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群墓有七八个或十余个墓葬排列在一起。如崧泽遗址的崧泽文化墓地，就有东北、北部、中部、南部和西部五个墓群，似乎每一墓群就是一个家族。另外，崧泽墓葬还发现了几个合葬墓。像崧泽遗址有一双人合葬墓，一为成年女性，头向 138°，面向左，左侧依附一具 7 岁左右的儿童骨架，均为仰身直肢。另有一个双人合葬墓，也有一成年女性，仰身葬，头左上方有一具二次葬胎儿骨架。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值得进一步探讨，反映的是不是就是母系氏族的特征？

到了崧泽文化的晚期，发现有男女合葬墓，福泉山遗址曾发掘一个男女合葬墓，另有一男二儿童的合葬墓。[10]男女合葬，一般认为是父系氏族社会应有的现象。这预示着家庭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夫一妻对偶婚的出现与逐渐稳定，反映了崧泽文化晚期婚姻制度的进步。种种迹象说明到了崧泽文化的晚期，已孕育出父系氏族制度。

崧泽文化脱胎于马家浜文化，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继承与延续，它具有了新的特点，新的面貌，“这是一支相当繁荣的新石器文化”[11]。而后出现的良渚文化，又是在崧泽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三　从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

### 上海境内的良渚文化遗址

良渚文化是距今约 5200—42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在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而得名。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为太湖流域，上海地区迄今为止已发现良渚文化遗址十多处。主要分布在今上海市闵行区的马桥，金山区的亭林，青浦县的福泉山、寺前村、果园村和金山坟，松江区的广富林等处。

通过对各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批精美多样的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生活用具，这些出土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良渚时期的生产工具，以磨光石器为主，种类很多，用于农业方面的，主要出现了磨制精细的大型三角犁。上海地区三角形石犁最早出现于松江汤庙村遗址的崧泽文化水井中，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则极为普遍。在金山亭林等遗址发掘的三角形石犁，为平面等腰三角形，顶端尖锐，两侧磨成单面刃，中间钻孔用于固定犁床。除石犁外，耕作工具还发现有石耘田器、石镰、半月形双孔石刀、石斧等。犁耕工具的改良与进步，为扩大种植面积、节省劳动力、提高土地垦殖率创造了条件，同时，也说明农业已日益成为良渚文化时期的主要经济部门。

陶器烧制是良渚文化极富特色的一大手工业。这一时期的陶器品种繁多，举凡鼎、豆、壶、罐、盆、盘、簋、尊，应有尽有，若细分，则有双鼻壶、圈足盘、阔把带流壶、阔把杯、大口缸，等等。当时的陶器制作大多采用轮制技术，器型丰富多采，既有典型的日常器皿，又有造型各异的礼器用具。泥质匀净细腻，器薄而规整，火候掌握较好。良渚陶器尤以黑衣灰胎陶著称于世，被誉为“良渚黑陶”。它的主要特征是器表纹饰有弦纹、竹节纹和各种形状的镂孔。部分黑衣陶器表刻有极细的鸟纹、鸟首蛇纹等各种精美纹饰，更显示出良渚时代的制作工艺水平。



图 1-8 良渚文化细刻纹带盖鼎
（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青浦福泉山出土的双鼻壶[12]，通高 18.8 厘米，带盖，盖上有两小孔，器身口沿饰弦纹，盖和器身通体细刻鸟首蛇纹（或称蟠螭纹），

圈足上有三个椭圆形镂孔。另有一阔把带流壶[13]，泥质黑衣灰陶，侈口，矮颈口沿一侧上翘成流，鼓腹，凹底，器身另一侧附一阔把，把上饰篦纹并有两小孔，以便于系绳。全器细刻曲折纹和禽鸟纹，口沿外壁饰五条平行弦纹。制作规整，造型美观，图案繁细。



图 1－9　良渚文化细刻纹双鼻壶
（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图 1－10　良渚文化阔把带流壶
（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以磨光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制作技术的进步，是原始手工业发展的重要表现。除在农业工具上出现精良的石犁、石刀、石镰外，还从各遗址尤其是从部分良渚时期的大墓随葬物中，发现了许多石斧、石钺及石制饰件，加工极其细致。石钺扁平，通体精磨，抛光极好，光亮如镜，刃口亦较锋利，但无使用痕迹。这可能是专门用于随葬的。而其他诸如石镞的大量出现，或许与当时军事征战行为的频繁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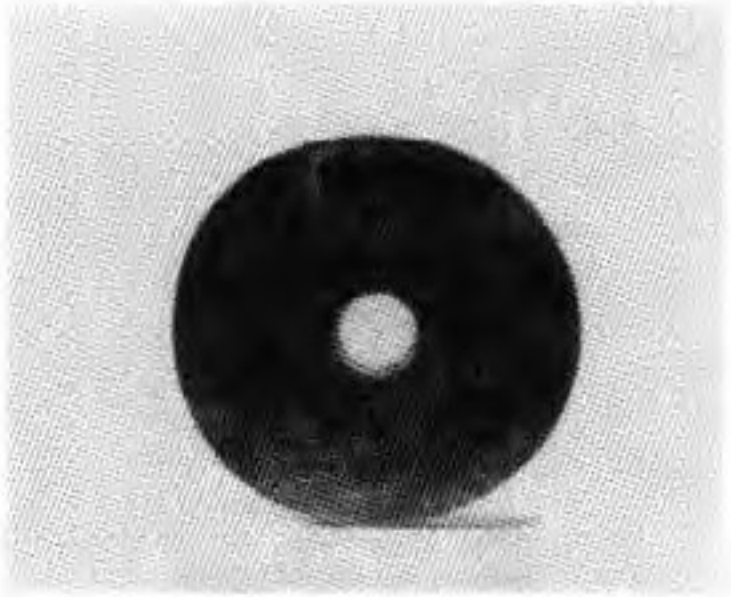
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加工，较之崧泽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数量、种类的增多，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中往往随葬着较多的玉器，琮、璧、钺、镯、锥形器、冠形器、珠、饰件，形形色色，多种多样；而且在材料与制作技术上也发生了飞跃。良渚文化玉器的用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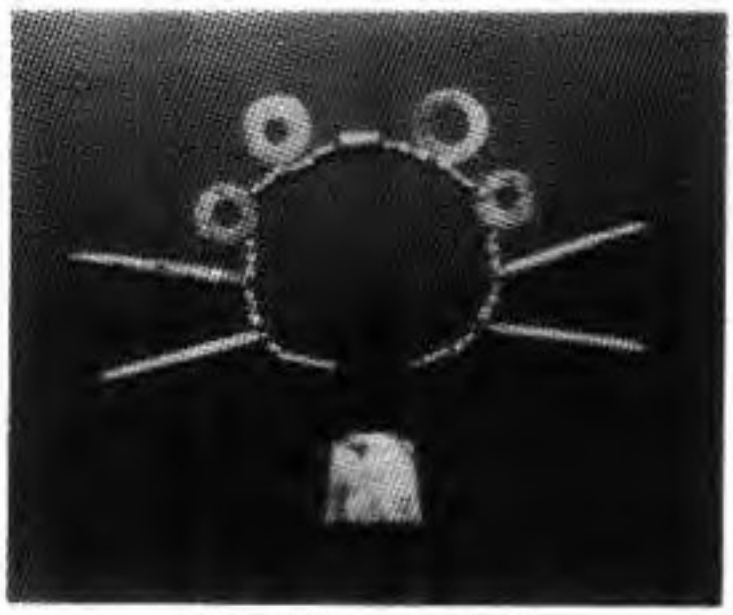
料，经鉴定属透闪石和阳起石的软玉，加工技术上，明显采用了旋转的工具，玉器雕琢工艺则开始使用减地法、浅刻、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其纹饰刻纹细达0.1—0.2毫米，可谓细如毫发，令后人惊叹不已。但是迄今为止，考古界对于良渚时期采用什么样的制玉工具尚未作出定论。



神像纹玉琮



玉璧



冠形器和玉串饰

图1-11　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玉器一组

在良渚玉器纹饰中，以神像形纹最为引人注目，有“神徽”之称。青浦福泉山出土的湖绿色玉琮[14]，上大下小，内圆外方，琮面以减地法凸出四块方座，并以四角为中线各刻一组神像形纹(也称兽面纹)，上端有两组凸起横棱，四角各有一只飞鸟，横棱中间或凸起的额、鼻、口、目部位刻满了几何形图案，刻纹极为细巧。这件玉琮为良渚文化中罕见的精品。对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这些神像兽面纹，有人在研

China

究后作了这样的破译:“是太湖酋邦社会信仰与神话系统的核心。对于良渚人来说,这种刻在不同玉器之上而又造型极为一致、使用极其广泛的兽面,是他们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15]从更深的社会意义上进行了发掘。

这一时期的水井也有所进步。上海地区的水井,最早见于马家浜时期,但那时尚属简易的土井。到了良渚时期,则出现了一种用二三块凹弧形的大木合围而成的木壁井。在青浦朱家角西洋淀所见良渚文化水井中,就出土过木制井圈,甚为独特。良渚时期人们的饮用水质得以进一步改善。

在上海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多处墓地。根据考古界提供的资料,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墓葬习俗情况可以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其中,在青浦福泉山遗址发现的墓地,尤其能说明一些问题。

福泉山遗址有一座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形状接近方形,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约7.5米。这在当时肯定算是一个大工程了,若根据良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估计需要动用上万的人工才能筑成如此大的土台。福泉山遗址中的良渚墓葬多为大墓,墓内随葬着大量精美的玉、石、陶器及象牙器。玉器中,有玉琮、玉璧、玉钺,格外注目。《周礼》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说明远古时期玉琮与玉璧曾作为祭祀天地的礼器,或是巫师作法时用来沟通天地的法器。良渚墓葬中出现琮、璧,很有可能是代表了墓主人生前的身份,或至少说明墓主生前拥有一定的权势。钺原为兵器,其形制类似斧但比斧要大些。良渚文化时期的钺有石、玉两种质地,大多扁平,光亮鉴人,刃部皆未见使用痕迹,有的玉钺在柄的上下端装有玉饰。钺在墓内的位置多为右手旁或斜置在胸前。这是一种权杖,象征着军事权力。在福泉山遗址曾发掘出一墓葬,共出土玉、石、象牙、陶器一百余件,其中细刻兽面纹象牙器放于死者腹部,他的右臂骨上有玉镯,旁有玉琮,右下肢骨上有玉璧,肢骨又下压玉璧,右侧堆放玉斧(钺)、石

斧(钺)等器物,众多的陪葬品,特别是细刻神像纹琮、璧、钺共出一墓,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权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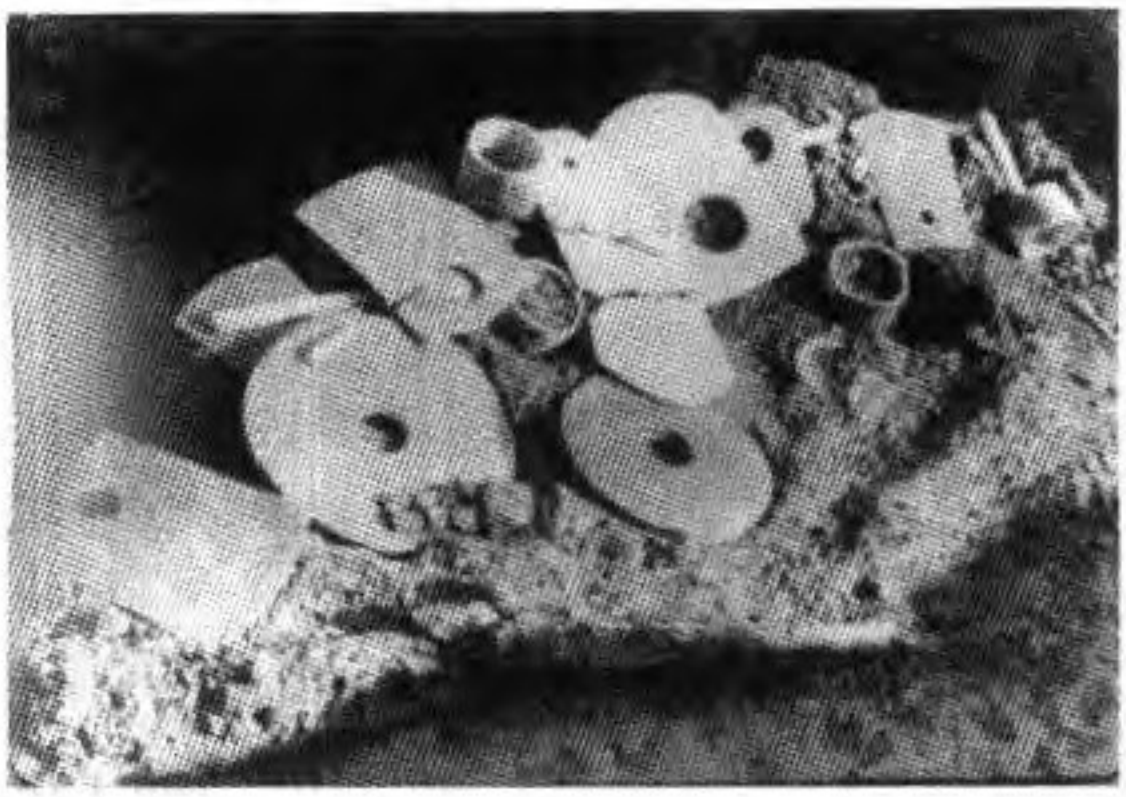


图 1-12 青浦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
发掘现场 图为随葬品堆

在福泉山良渚墓地发现有人殉迹象。一个长方形浅坑木棺墓中,葬着一名成年男性,身旁随葬有许多石器、玉器及成堆的陶器,陶器涂有红黄色彩绘图案,极为精致。在木棺的东北角则另有一具骨架,无葬具,骨架鉴定为青年女性,屈身,上下肢弯曲分开,状似跪着倒下的样子,头向西北,骨架压在墓坑角上,头、足处于浅坑外与一件大口缸在一起。根据情形判断,其身份可能是女奴,好像是成年男子掩埋后再以人牲祭祀。还有一座大墓坑旁也挖出一个小坑,有两具人骨,呈反缚挣扎状,鉴定为一青年女性和一少年,当亦属人牲祭祀坑。[16]

在福泉山良渚高台墓地上还发现了当时进行的大规模祭祀痕迹[17]。该高台墓地中心部位,有一处大型燎祭祭坛,长约 7.3 米,宽 5.2 米,呈阶梯状,其上置一夹砂红陶大口缸,整个祭坛均有火烧痕迹,每一层面有介壳屑,此为一处大型燎祭活动场所。这种仅见于高台大墓的祭祀礼仪,系良渚时期的显贵专有。

China

良渚文化墓葬随葬品的多寡差异，反映出贫富差别、等级区分，人殉迹象及祭祀痕迹，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表明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已开始分化，有了不同的阶层。良渚大墓随葬有成组的玉礼器，说明当时已形成了一定的礼仪制度。

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文字。在上海马桥遗址下层出土的一件黑衣灰陶阔把杯，属于良渚文化器物，杯部刻划两个符号，横行排列。左面一个结构与“戌”字近似，但所像器物的刃部作弯曲形，类于甲骨文的“戊”字。右面一个轮廓很像是“田”，已不完全，不能准确释读[18]。从马桥遗址出土的良渚陶片上所带的陶文，以及结合邻近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良渚文化晚期鱼篓形贯耳壶上刻有的四字成组陶文来看[19]，“在所有已发现的史前陶器刻划符号之间，良渚陶器的这些例子最符合严格的文字标准”[20]。

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已经进人了文明时代。继良渚文化而起的文化，一些学者称之为马桥文化[21]。

## 马 桥 文 化

马桥文化，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地区，以上海闵行区马桥遗址的发现为典型而命名。

马桥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器。石器的制作方法基本与良渚时期相似，只是此时的加工略显粗糙。往往利用板岩或页岩的平整的自然断裂面打制成型后，只对刃部磨制，石器穿孔也常用琢凿法。石器之种类，主要是有肩石斧（或称钺）、有段石锛、半月形石刀、石镰、石锄、石戈、石矛、石凿、石镞、石纺轮等。这些器具的制作，大多用于农业生产，品种之增多，说明扩大农耕需要更多的工具。

马桥文化的骨器加工，也遇到了同石器制作一样的现象，时常在对骨料初步加工成型后，仅磨制刃部，通体精磨极少。骨镞的出土，

以及在马桥遗址中留存下的大量兽骨，包括家猪、牛、狗、鹿、四不像、獐、虎、麂、龟、鲨、蟹、蛤等等动物，这说明当时的渔猎在经济部门中仍占一定地位，饲养业也有了初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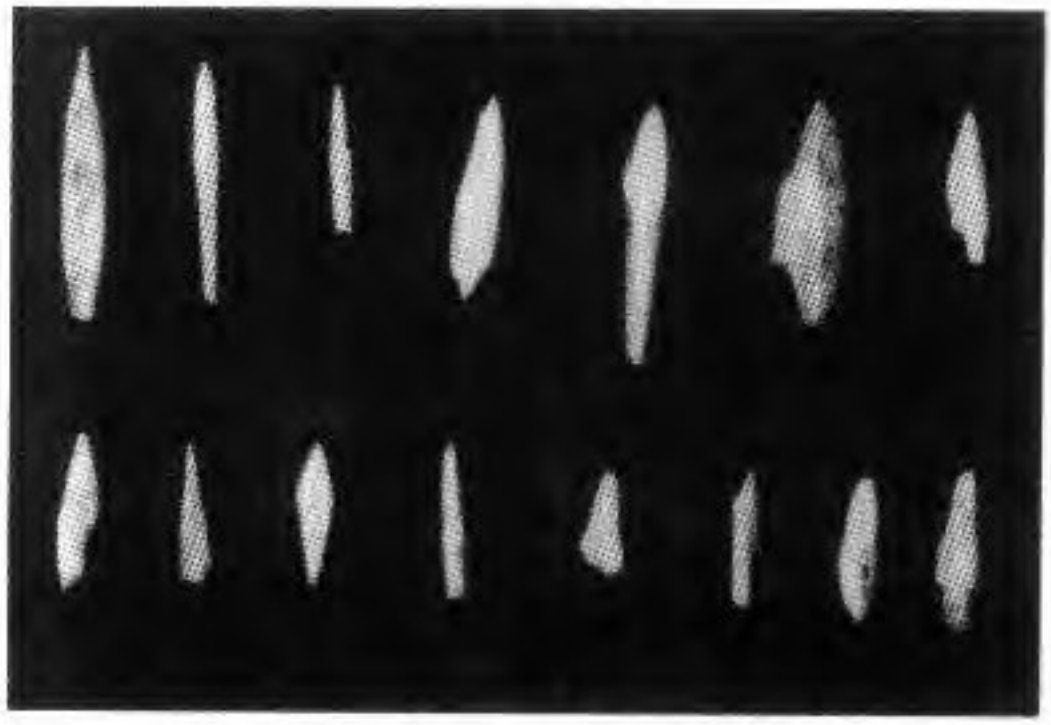


图 1－13　马桥文化骨镞一组
（闵行马桥遗址出土）

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用作生活用具。从陶质上可分为夹砂绳纹陶、泥质印纹陶和泥质灰陶、黑衣灰陶。夹砂绳纹陶的制作方法为泥条盘筑成型后再用慢轮修整和拍印绳纹，器物颜色多为红色，器型主要见有鼎、甗、釜等炊器。泥质印纹陶，其制作方法与夹砂绳纹陶相同，但其陶色由于烧制时所受火候的不同，而有淡黄、橙黄、红褐、橙红、紫褐等陶色，陶质亦随之软、硬不一，拍印有篮纹、叶脉纹、方格纹、席纹、曲折纹、云雷纹等多种。这类印纹拍印时在器内使用陶垫，器内壁留下清晰的印窝，器型则有罐、盆、碗、杯以及鸭形壶等。泥质灰陶、黑衣灰陶的制作使用轮制技术，器表除素面外，常见拍印一组带状云雷纹或鱼鸟纹，这些纹饰主要仿自青铜器。器型分觚、觯、尊、豆、簋等。马桥文化时期的陶器特点也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但是，马桥文化时期的玉器极少，这与良渚文化时期大量玉器的出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